

现实·媒介·认知： 幼儿教师形象的三重建构

◆吴文涛 张旭

摘要 近年来少数幼儿教师的虐童行径经媒体传播后致使幼儿教师形象呈现断崖式坍塌。从框架理论的视角审视,这种坍塌呈现出三重景观,即现实形象的滑坡、媒体形象的颠覆与认知形象的偏差。站在教育学立场反思,上述问题的主要原因在于准幼师的培养未能先行、幼教舆论工作的缺位以及媒介素养教育的不力。为此,在未来实践中,需着重加强部分新进幼儿教师培训、促进各方协同推进幼教舆论工作以及针对关键性群体开展媒介素养教育,从客观现实、媒介建构以及公众认知三个不同的互动侧面重塑幼儿教师的良好形象。

关键词 幼儿教师形象 框架理论 现实形象 媒介形象 认知形象

DOI:10.14121/j.cnki.1008-3855.2017.10.006

近年来,有关幼儿教师的负面报道时常占据着诸多媒体的头版头条。从“江苏女幼师电熨斗烫伤7名儿童”到“温岭幼师虐童近百次”,再到令人发指的“幼儿园全班遭老师针扎”等等,层出不穷的虐童事件使得本应惠及民生的学前教育忽然之间成了无数家长的忧心之地。毋庸置疑,此类行径经各类媒体的传播后必然引发公众的极度愤慨,刺痛社会的爱幼善心,使得原本美好的幼儿教师形象呈现断崖式坍塌。

更令人担忧的是,上述事件所衍生的“负能量”不仅已变异为广大幼儿教师挥不去的“抑郁症”,且正演化为日常园内工作搬不走的“绊脚石”,更有可能成为学前教育发展绕不开的“拦路虎”。如此境况下,重塑幼儿教师的正面形象,为正处发展期的学前教育营造良好的外部氛围势在必行。形象问题一般被认为是一个传播学问题,这是因为,形象的塑造离不开信息的传播,而传播哪些信息实际上又抹不去“框架”的筛选。鉴于此,本文试图以传播学“框架”理论为分析框架审视当前境况,以期为重塑幼儿教师形象提供一种思考进路与些许实践对策。

一、“框架”及其互动层面：幼儿教师形象分析的学理依据

长期以来,在新闻传播领域,框架理论已成为研究形象问题的重要工具,数十年发展历程中百家争鸣,其理论内涵也愈发繁杂。因而,从框架理论视角重塑幼儿教师形象,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恰切运用框架理论来分析幼儿教师形象问题?于是,我们有必要对框架理论的内涵作简明梳理,进而选取其中的合用思想作为我们分析问题的学理依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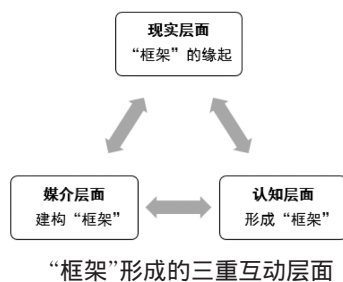
一般认为,框架理论的思想肇始于美国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的名著《框架分析》。在该书中,戈夫曼指出,“框架”代表个人组织事件的原则与主观过程。他认为,社会事件纷繁复杂,须透过符号转换方能成为人们的主观认知,这种转换的过程是“框架”的基础。^[1]换言之,“框架”是社会事件从现实层面转换至人们的认知层面的桥梁,人们藉由“框架”整合信息,了解事实。

事实上,戈夫曼所试图描述的问题是人们如何接受与处理源自社会事件的各种信息,这本质上是

吴文涛/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博士研究生 (南京 210097) 安徽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张旭/安徽师范大学附属幼儿园 (芜湖 241000)

有关信息传播的核心议题。正因如此,框架理论后在传播学领域踵事增华,诸多传播学者以其来研究大众传播媒介如何报道社会事件,旨在检视传播媒介如何介入大众主观认知客观现实的过程。正是在传播学范畴中,美国框架理论研究的集大成者威廉·加姆森(William A. Gamson)对“框架”的内涵做出了界定。他认为,框架的定义分为两类:一是作为名词的“框架”,喻指“边界”,即框架如同镜头,镜头内的实景成为人们认知世界的基础,而作为动词的“框架”,意为“架构”,指框架帮助人们建构意义,以了解社会事件发生的原因及脉络。加姆森进一步指出,传播媒介中的框架兼具正面意义与负面效果。框架的正面意义在于协助人们整理信息进而更有效地思考,而其负面效果在于,它框限了人们主观认识社会的活动,容易成为意识形态控制或刻板形象建构的主要工具。^[2]

综上所述可以发现,框架理论早期关注的是“框架”在现实层面与认知层面的转换,而后期所强调的是“框架”在信息传播的三重层面互动。^[3]其中,有两个重要的思想是本文分析幼儿教师形象问题的核心依据(如图所示)。



首先,“框架”跨越了“三重层面”。一是现实层面,客观现实是框架的缘起,无论建构怎样的框架必须以现实为内核,当然,不同的框架中,这一内核会有不同的再现方式。二是媒介层面,传播媒介是建构框架的主要途径。理想情况下,媒介层面建构的框架应与现实层面一致,但由于种种因素,实际中不可能达到。三是认知层面,即在人们思想上形成的“框架”,它一方面源自现实层面,另一方面又会受到媒介层面的“框架”影响。

其次,“框架”是“互动”的。这就意味着“框架”具有重新塑造的可能,并且,重塑需要从每一层面入手,每一层面的改变都会影响其他两个层面,三个层面的转换互动过程中将能实现最终的“框架”塑造。

大量事实已反复证明,在网络媒体飞速发展的今天,他人认知的教师形象很多时候不仅源自对客观真实的具体考察,而且更多产生于大众媒体建构的一个看似真实的“虚拟世界”。正因如此,上述两点对于分析当下幼儿教师形象问题而言至少有两方面启示:第一,可从“框架”形成的三重层面着手检视幼儿教师形象坍塌的具体情形,进而去找寻其背后的深层原因。第二,由于三重层面是互动的,便可从每一层面审思,寻求恰切的实践对策,协同重塑幼儿教师的良好形象。下文论述正是依此结构展开。

二、框架理论视野下幼儿教师形象的坍塌景观

无论是前期如“春蚕”般的无私奉献,还是后期如“园丁”般的悉心呵护,师道尊严的启蒙者这一正面形象素来是人们对幼儿教师的固化认知。然而,从框架理论的三重层面审视,我们发现,幼儿教师形象已与过往的历史传统形成了强烈的反差。无论是现实层面还是媒介层面,抑或是认知层面,幼儿教师形象已然经历了不同程度的坍塌。为更为清楚呈现这种坍塌景观,本文仅列举颇具代表性的一则案例:

10月24日,网友“将讲 090080”在微博里发了一张照片,照片里,女老师面带微笑地揪着一名男童的左右耳朵将其提离地面,男童因剧痛张着嘴巴哇哇大哭。该照片一经曝光就引起强烈关注,各路媒体纷至沓来,纷纷报道或转载该事件。公众从不同媒介获取到事件的相关信息,整个舆论开始众口一词地谴责甚至咒骂虐童幼师。^[4]以上是对2012年10月24日震惊社会的“浙江温岭女幼师虐童”事件及其影响的客观叙述,其他幼师虐童事件基本情况与其大体一致。从框架理论的视角来看,在上述事件中,幼儿教师形象的坍塌呈现出三重景观,即现实形象的滑坡、媒体形象的颠覆与认知形象的偏差。

1. 幼儿教师现实形象的滑坡

如果从比较的意义上看,以“频频”形容当下幼师虐童事件的发生情况并不为过。这是因为,与其他教育阶段相比,当下学前教育阶段中体罚事件的确更多,且性质更为恶劣。究其原因,越来越多不合格教师的出现是我们首先必须承认的现实。这里强调的“不合格”主要是指存在部分“幼儿教师”尚未具备教师资格,即是根本未曾获得担任教师的基本资格证书。有调查显示,从全国范围来看,幼儿教师持有

教师资格证书的比例偏低,总体比例仅为43.9%,其中东部地区为54.2%,中部地区为43.9%,西部地区为33.7%。而这种现象在民办幼儿园更为严峻。对河南省与江西省民办幼儿园的调查显示,均有超过70%的幼儿教师尚未取得教师资格证。⁹教师资格证不仅是幼儿教师从业的许可,也是幼儿教师资历的证明,更是幼儿教师德行的保证。如果未经许可且尚无资历,那么幼儿教师在实际工作中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便不难理解。尤其是在头顶“教师”光环的同时却连基本的德行都得不到保证的情况下,失德教育事件的发生便更有可能,幼儿教师现实形象的滑坡也就成为了一种必然。

需要说明的是,此处所言的“滑坡”,并不是认为如今的幼儿教师能力、学历等方面不如以往的教师,相反,随着教育的发展,教师们这些素质都有了一定的提升。之所以认为其“滑坡”,更多的是对幼儿教师整体形象的一种判断。即是说,从总体上看,由于短时间内幼儿教师数量的跨越式增长,部分未具备资格且并不适合从事幼儿教师的人员进入了这个群体,他们频频出现的失德行为使得幼儿教师整体上的现实形象相对过往而言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滑坡。

2. 幼儿教师媒介形象的颠覆

时下,在各类传播媒介中,幼儿教师形象的颠覆已经显而易见。数据显示,仅在百度新闻以“幼师虐童”搜索,相关新闻达14200余篇,且多为2010年以来发布。此外,就连颇具权威性的百度百科都已经将“幼师虐童”作为专有名词收录其中。更为严重的是,时下有关幼儿教师的新闻报道正由“对个体的指责”演变为“对集体的抨击”。颇具代表性的例子首推腾讯新闻开设的《中小学观察站》栏目,该栏目2014年第12期便以“幼师虐童!学前教育怎么了?”为主题,汇集了近年来诸多虐童报道,其中不乏“拿什么拯救你?学前教育?”、“幼教行业 整体滑坡”、“幼师生:性别比扭曲,多有心理问题”等评论。¹⁰这些评论无一例外地将矛头指向了整个幼教行业与学前教育领域。当负面报道不断蔓延,当抨击指责不断泛化,幼儿教师便在集体层面由历史传统中的“启蒙者”被悄然颠覆成新闻报道里的“虐童人”,并且成为整个幼教行业滑坡的罪魁祸首。

3. 幼儿教师认知形象的偏差

一旦幼儿教师被舆论集体否定,一旦幼教行业被

媒体频频质疑,公众极易因此而产生各种焦虑:我的孩子会受到伤害吗?教师还可以相信吗?幼儿园还值得托付吗?于是,舐犊情深的无数家长们必然会惶恐不安,进而千方百计地寻求“监控”之道。之后又备受关注的“录音笔事件”与“摄像头争议”便是因此而生。

显然,无论是偷带录音笔还是强装摄像头,家长们的舐犊之情应当获得理解。因而,需要理性反思的首先不是家长们的应对方式是否合理,而是家长们为何会采取如此方式应对。事实上,家长们形形色色的应对策略折射出的实为关涉幼儿教师的信任危机。然而,这种信任危机多源自一种缺乏证据的直观感知,稍作统计便能发现,这种直观感知其实并没有多大可信度。笔者对近年来被曝光的虐童做了一个简单的数量统计后发现,自2010年至今,被媒体所曝光出来的幼师虐童事件为二十余起,对应的涉事教师为三十余人。如果从全国逾百万的幼儿教师队伍的角度来看的话,虐童幼师显然仅占据极小的比例。抛开事件的性质,仅从数量的角度看,如此比例并不算高,或许可以说这是符合常理的一个比例。

正是基于上述考察,笔者窃以为,实际上隐藏在诸多负面事件背后的真实面貌是:幼儿教师群体中的“害群之马”其实仅是极少数,绝大多数幼儿教师都能够履行岗位的职责、完成本职工作,并且还不乏一部分教师,她们为了幼儿的健康成长能够去超量工作与无私奉献。如此来看,前文提及的信任危机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便在于公众并未了解广大幼儿教师的真实面貌。从框架理论的视角来看,在数十起幼师虐童事件发生后,源自现实层面与媒介层面的关涉幼儿教师形象的“框架”已然对公众认知层面的“框架”产生了影响,在三重层面的“框架”互动过程中,社会公众对幼儿教师的认知形象已然发生偏差。

三、幼儿教师形象坍塌的教育学归因

理性审视幼儿教师形象坍塌的全过程,负面幼儿教师形象肇始于现实层面的幼师虐童事件的频频发生,加速于媒介层面的大众媒体对相关事件的集中宣传,最终固化于公众认知层面对幼儿教师的信任危机。在此过程中,导致幼儿教师形象坍塌的因素必有很多,而本文主要站在教育学的立场反思其背后的主因。延续前文的思路,下文针对幼儿教师形象坍塌的三重景观分别剖析问题背后的症结所在。

1.现实形象的滑坡源自准教师的培养未能先行

如前所述,现实形象出现滑坡首因在于一批不合格教师的存在。因此,首先需要反思的问题是:为何恰恰在此阶段会集中出现一批不合格的教师?从时间上来看,自2010年起,我国学前教育开始跃升式发展,其必备条件是大量的幼儿教师。即便当年就相应扩大师范院校的招生规模,完成所需幼儿教师的培养仍需一定的时间周期,一般专科学历教师需三年,本科学历教师需四年,而初中毕业起点专科学历则需五年。即是说,按正常教育体制,培养学前教育大发展所需幼儿教师至少应需3年以上的时间。

然而,近年幼儿教师数量的增长情况却并非如此。通过查阅教育部历年来全国教育事业统计公报发现,2010年之前的五年(2006年至2009年)中,幼儿教师队伍数量增长量均不超过10万人/年,最高的为2009年的9.58万人;而自2010年起,幼儿教师队伍成倍式增长,其中2010年增加17.75万人、2011年增加19.07万人、2012年18.15万人、2013年增加20.76万人。^[7]显然,仅从数据来看,至少在2010至2013年间,每年都会产生近10万非科班出身的幼儿教师。不论这些教师的来源是否符合要求,有一个基本的判断是:这些非科班出身的教师算不上完全合格的幼儿教师,原因在于,他们或是尚未掌握学前教育的理论知识、或是尚未具备教育教学的专业技能、或是尚未达到为人师表的师德要求。不合格的幼儿教师的出现便意味着非正常教育事件发生的概率会大大增加。概言之,依笔者陋见,当下幼儿教师现实形象之所以滑坡,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便在于,在学期教育大发展初期,对准幼儿教师的培养未能先行,从而导致一批不合格人员混入幼师队伍,成为“害群之马”。

2.媒介形象的颠覆凸显幼教舆论工作的缺位

从教育社会学的视角考量,合理地引导舆论、争取舆论的广泛支持,已经成为教育改革和发展的重要推动力。^[8]幼儿教育领域的健康发展亦不例外。所谓舆论,是指“公众关于现实社会以及社会中的各种现象、问题所表达的信念、态度、意见和情绪的总和”。依此概念,吴康宁先生曾明言,合理舆论的关键在于对“公众”与“表达”两大关键词的把握。首先,舆论必须是“公众”的而不能是“个人”的。其次,舆论是需要“表达”出来的,藏于内心的想法或囿于局部

的见解均不足以形成舆论。^[9]在传播技术发达的今天,无论多么强烈的意愿,若不以适切的方式向外界表达,都难以成为舆论的组成部分。换言之,合理的舆论需要多方教育主体(如教育行政部门、幼儿教育专家、教育媒体工作者等)的协同参与与适时发声。

因此,需要反思的是,在幼儿教师媒介形象加速坍塌过程中,我们是否针对性地开展了幼教舆论工作,从而有效体现各方教育主体的社会关怀。令人遗憾的是,迄今来看,我们的幼教舆论工作在一定程度上是缺位的。首先,涉事教育行政部门总是在负面事件发生后开始危机公关,却忽视了在平时工作中针对性地开展正面宣传工作。其次,少有幼儿教育专家能在相关负面事件与公众信任危机产生后适时发声,以科学理论引导公众进行负责任的原因分析与建言献策。再者,在相关事件发生后,主流教育媒体工作者也未能有效地借助主流教育媒体平台实事求是地引导正面幼教舆论的形成。

3.认知形象的偏差反映媒介素养教育的不力

如前所述,公众舆论的极力抨击与无数家长的过分质疑是认知形象偏差的现实表征,这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在新媒体形势下媒介素养教育的不力。媒介素养教育自提出以来,批判性思维始终是其强调的核心素养之一。“批判性思维者具有开明和公正的心智,会搜寻证据,掌握全面信息,关注他人的观点及其理由,不作超出证据的断言,愿意考虑不同思路并校正观点。”^[10]依此来看,倘若媒介素养教育能够有效开展并能使得多数公众成为批判性思维者,那么他们便能在极度愤慨之后回归理性,在随意抨击之前如实考证,在全面了解幼儿教师的真实面貌后便能合理认知相关负面事件。果若如此,那么这些公众非但不会因对个别事件的愤慨而不承担责任的随意指责与无端猜忌,反而还能成为广大合格幼儿教师群体的守卫者。

四、重塑幼儿教师形象的可能路径

如前所述,从框架理论的视角来看,关涉幼儿教师形象的“框架”在三重层面互动,若要有效重塑幼儿教师的良好形象,需从三重层面协同推进,寻求转机。结合上述反思的教育学归因,下文针对性地提出一些可能的实践路径。

1.着重加强部分新进幼师培训,优化现实外化

形象

理性审视当前关涉幼儿教师的新闻报道中的“框架”,应当看到的是:在“框架”之内,媒体报道确有其“客观”之成分,并非空穴来风,而是事出有根。基于此,要想优化客观真实形象,首先应从根源着手,一方面要将确实不适合从事幼师职业的人员从队伍中淘汰出去,另一方面应当使部分有可能转变的人员由不合格转化为合格。

如前所述,在学前教育大发展的初期,一批非科班出生的人员进入幼儿教师队伍,在比较的意义上看,他们因为缺乏一些必需的素质而更有可能成为不合格的幼儿教师。因此,当务之急更应针对这部分新进教师展开考核培训。具体而言,首先是适当地考核,如可以采取适当的心理测试,这种测试应能真正把深层的素质测出来,以便能够对他们的个性心理特征是否真正适合当幼儿教师加以甄别,确实不合适就应当淘汰。其次是针对性培训,这主要是针对个性心理特征符合幼儿教师要求而理论水平与实践技能有所欠缺的部分群体。对于他们来说,培训的目标在于使其由不合格转为合格。当然,如果想上述两方面的措施能够得到切实执行,相关的教育制度保障不可或缺。

2. 促进各方协同推进幼教舆论工作,修缮媒介建构形象

媒体建构形象既是客观真实形象的再现,也是公众认知形象的中介,在三者互动过程中发挥着“桥梁”的关键作用。因此,如果说优化客观真实形象是防患于未然,那修缮当下媒体上有关幼儿教师的刻板印象便是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根据框架理论的启示,消除媒体上幼儿教师的刻板印象可从重新设置正面的“框架”入手。在此过程中,各方教育主体应共同参与、主动出击,以实际行动介入大众媒体的话语空间,形成正面幼教舆论的强大合力。

对于教育行政部门来说,负面事件发生后的危机公关固然重要,但平时工作中的积极引导更加不可忽视。譬如,可以通过树立正面典型,让优秀个体为幼儿教师代言。教育行政部门应试图通过多渠道宣传让优秀教师走上前台,走向大众,以他们为典型为幼儿教师建构积极向上的正面形象。对部分幼儿教育专家而言,他们应充分发挥教育理论的社会关怀与科学价值,借助报刊杂志适时发声,以现实为支撑,凭证据来分析,引导公众更加理性的看待个体事

件。最后,对于教育媒体工作者而言,他们是开展幼教舆论工作的中坚力量。教育媒体工作者应充分发挥其媒体平台的效用,与其他各方共同营造良好的幼教舆论氛围。概言之,当幼儿教师群体面临“媒介形象颠覆”时,我们更需要各方力量的参与,只有教育行政部门、相关教育专家、教育媒体工作者等各方履行相应角色,幼儿教师们才能获得积极、合理的舆论支持,才更有可能在舆论场域中受到公正评价,其媒介形象方能得到及时修缮。

3. 针对关键性群体开展媒介素养教育,扭转公众认知形象

从框架理论来看,优化现实外化形象与修缮媒体建构形象均有助于公众认知形象的扭转。然而,需要注意的是,这两种转变均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很难在短时间内取得实效,尤其是在新闻报道环境并不良好的当下。因而,通过提高关键性群体的媒介素养尤其是批判性素养便显得更为直接有效。一直以来,“媒介素养教育的主旨在于培养大众主动意识,使得大众在理性认识的基础上学会甄别媒介及其传播内容的正价值与负价值。”^[11]无疑,如果幼儿家长等关键性群体能够批判性地认知有关幼儿教师的负面报道、甄别式地看待幼师虐童的个别事件,对于幼儿教师的错误认知便能迅速扭转。具体而言,针对关键性群体的媒介素养教育可以依托家长学校、家园沟通平台等载体,重点从以下两方面开展:

第一,帮助其细致了解新闻产生的过程。要想使得幼儿家长等群体理性地看待幼师虐童事件的相关报道,一个可取的途径是让他们知道当前新闻机构是如何对这些报道进行加工和生产的。媒介素养教育的核心是“解构”,即分解媒体信息、操作实践、流程、机构以及影响的具体构件,并进行深入分析,通过这种教育工作,使得大众了解新闻报道与现实生活的异步关系。^[12]显然,倘若幼儿家长等关键性群体可接受此类培训,便能了解到新闻产生的基本方式及其背后的人为因素,从而自主发现新闻报道与真实事件间可能存在的 inconsistency。第二,引导其批判认知新闻传递的文化。当下的媒介素养教育还需要超越媒介解构,走向文化建构,从解构技巧转向批判素养,培养爱和积极行动的能力。^[13]从文化层面来看,新闻报道中常常内在裹挟的一种意识形态上的控制文化,操纵着公众对真实事件的认知。而媒介素养教

育就是要让人们去批判认知这种貌似价值无涉的“框架”背后所蕴涵的意识形态控制力量。^[14]也就是说,我们应当着重培养关键性群体的批判性素养,引导其在得出定论前主动搜寻相关证据,全面了解事件信息,恰当认知部分新闻机构的娱乐性与营利性动机,从而促进其自觉抵制此类新闻报道的奴役,主动选取有正确判断的媒介信息。显然,如果上述媒介素养教育能够切实有效,相关关键性群体不但自身不会对幼儿教师产生错误认知,相反,他们还有可能去主动维护幼儿教师的良好形象,在现实生活劝解与引导存在认知形象偏差的其他群体。

五、结语

幼儿教师形象关系到教师的职业效能,关联着幼儿园的教育质量,更关乎于学前教育的发展前景。因此,有效扭转当前社会中弥漫着的对幼儿教师形

象的错误认知,是当前学前教育领域中不得不加以考虑的重要课题。无疑,客观现实、媒介建构以及公众认知是重塑幼儿教师形象需经历的三个不同的互动侧面,每一类形象的改观均有利于另外两类形象的提升,三者协同推进则能最为有效地重塑幼儿教师的良好形象。当然,除此之外,我们还应期待的是,广大幼儿教师能自觉地从令人遗憾的负面事件中汲取深刻教训,从社会各方的理性批判中反思良苦用心,惟其如此,才能在职业倦怠时不忘初心,才能在外界误解后安之若素,才能真正用爱诠释天使之名,良好的幼儿教师形象方能“永葆青春”。

本文系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安徽省重大教育舆情的演化规律与疏导路径研究”(AHSKQ2016D37)、“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资助项目”的部分成果。

(责任编辑 陈霞)

参考文献

- [1]Goffman E. Frame analysis[M]. New York: Harper &Row, 1974 :10-11.
- [2]臧国仁.新闻媒体与公共关系(消息来源)的互动:新闻框架理论的再省[M].台北:三民书局,1999. 142-145.
- [3]张克旭,臧海群,韩纲,等.从媒介现实到受众现实——从框架理论看电视报道我驻南使馆被炸事件[J].新闻与传播研究,1999 (2):2-10.
- [4]浙江温岭女幼师虐童[EB/OL].[2016-12-28].http://opinion.china.com.cn/event_1806_1.html
- [5]王默,洪秀敏,庞丽娟.聚焦我国民办幼儿园教师队伍的发展:问题、影响因素及政策建议[J].教师教育研究,2015 (3):36-42.
- [6]幼师虐童! 学前教育怎么了?[EB/OL].[2016-09-15].http://edu.qq.com/zt2012/sczzmn/childabuse.htm.
- [7]教育部.教育发展统计公报[EB/OL].http://www.moe.gov.cn/jyb_sjzl/sjzl_fztjgb/.
- [8]骆正林.社会舆论对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支持模式[J].教育发展研究,2014 (Z1):14-22.
- [9]吴康宁.反思我国教育改革的舆论支持[J].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12,11(2):5-9.
- [10]戴维·希契柯克,张亦凡,周文慧.批判性思维教育理念[J].高等教育研究,2012 (11):54-63.
- [11]吴文涛,张舒予.从抵制到赋权:论西方媒介素养教育价值取向的历史演变[J].当代教育科学,2016 (5):44-47.
- [12]张毅,张志安.美国媒介素养教育的特色与经验[J].新闻记者,2007 (10):66-69.
- [13]何雪莲.超越解构主义:新媒体时代之媒介素养教育[J].教育发展研究,2012 (2):24-27.
- [14]班建武.教师媒体道德形象的影响及原因、对策分析[J].教师教育研究,2007 (6):28-32.

Reality·Media·Cognition: The Triple Construction of Kindergarten Teachers Image

Wu Wentao & Zhang Xu

(College of Science Education,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7;

College of Science Education, the Kindergarten of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Wuhu 241000)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since some teachers' abusing child is exposed to the public by media, the image of kindergarten teachers quickly collaps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rame theory, kindergarten teachers is facing triple cases: the worse realistic image, the distorted media images and the biased cognitive image. In the viewpoint of pedagogy, no training prospective kindergarten teachers ahead of time, not enough public opinion work about preschool education and lack of media literacy education are the major reasons. Therefore, in the future practice, we should strengthen some new teachers' training, enhance the ability of cooperative public opinion work of various parties concerned and carrying out the critical group' media literacy education. Remodeling the good image of preschool teachers from three different aspects: objective reality, media construction and public cognition

Keywords: the image of kindergarten teachers, frame theory, objective true image, media construct image, public cognitive image